

■ 文学研究

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①

——新世纪乡土小说与中国农村变革系列研究

李兴阳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关注现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严峻现实,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作为危机之源的乡村权力。揭示与批判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不断膨胀的乡村权力崇拜意识;二是家族、资本和黑恶势力影响下的乡村权力建构的非正当性;三是丧失“人民性”的乡村权力给乡村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四是肯定农民们作为弱者所采取的多种反抗形式的正当性。新世纪乡土小说由此表露出对乡村权力建构非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治理危机;乡村权力;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36-05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①,叙述当下中国乡村现实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俨然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潮”。而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乡村权力,则是叙述中国乡村现实生活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不断加速的“去乡村化”过程中,乡土中国虽然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大得多的发展,但与之相伴而生的乡村治理危机也是史无前例的^②。乡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农业资源危机日益凸显;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其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等都在急速增长,政治诉求也在不断升级,所承担的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大,如政府的暴力镇压等;乡村社会黑恶势力日益滋长,甚至与乡村权力执掌者沆瀣一气,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苦难现实中,对既有生存方式与生存意义产生认同危机的农民,在道德信仰上也就产生了怀疑、动摇乃至厌弃,从而出现了道德失范和道德信仰危机;农村基层政权出现功能性退化,甚至出现黑社会化和流氓化倾向;乡村权力执掌者攫取权力不轨,为政不廉,执政不公,贪腐盛行。凡此种种,使得“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依旧是当下中国乡村现实的真实写照。新世纪乡土小说在看取乡村苦难现实、直击乡村治理危机的同时,常将批

判的笔锋不约而同地指向作为直接根源的乡村权力。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治理危机的揭示,对乡村权力的批判,首先指向乡村日益变质变味、不断膨胀的权力崇拜意识。《羊的门》(李佩甫)、《日光流年》(阎连科)、《秦腔》(贾平凹)、《民选》(梁晓声)、《向上的台阶》(周大新)、《白豆》(董立勃)、《土地神》(贺享雍)、《乡村豪门》(许建斌)、《民意》(陈启文)、《村长乡长一个妈》(黎晶)等小说,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乡村权力崇拜意识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政治经济基础和现实表现等,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

中国乡村权力崇拜意识的日益膨胀,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最突出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遍布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专制主义,就是由之而来的绝对权力和官本位意识。与其联系的文化心理积淀、价值观念、人身依附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① 收稿日期:2013-03-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09ZWB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ZW059)

作者简介:李兴阳(1961-),男,湖北麻城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乡土文学研究。

①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时间起点,学术界的观点不一,一种观点将时间起点定在20世纪90年代;另一种观点基本遵从公元纪年法,以2000年为起点。本文遵从前一种说法,将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纳入到“新世纪”中。有关观点参见李兴阳《“新世纪”的边界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边界》(《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1期)。

②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治理被认为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新华文摘》2001年第12期)。

等,都潜藏在不同形态的现代文化形式中,成为其“深层现实”。这就是权力崇拜的虽为“深层”却并不那么隐蔽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乡村权力崇拜意识的日益膨胀,更有坚实的现实政治经济基础。哈耶克在谈论极权主义统治“为什么最坏者当政”的问题时,引用阿克顿的名言说:所有的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而所谓绝对权力就是缺乏监督的权力^{[1]129}。当代中国乡村的权力,是最缺乏监督的权力。有权者在权力场中争权、专权和弄权,无权者则在承受来自权力的暴虐的同时,畏惧权力、躲避权力和渴求权力。权力之所以如此诱人,如费孝通所说,是因为“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中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2]61}而当下中国乡村的现实是“权力的代理者不仅可以通过权力获得正当或不正当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能在权力的运行中感到一种心理的愉悦和满足、人性的自由伸展”^{[3]686-689}。这就是中国乡村权力崇拜的现实政治经济因由。

中国乡村权力崇拜的现实表演,则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在梁晓声的《民选》中,翟村老村长韩彪因为有私人银矿,成为全县飞扬跋扈的大富豪,在翟村里欺男霸女,为富不仁。村民们利用“民选”的机会,选掉了他们一向畏惧的有金钱和权力背景的霸道村长,用他们手上的那点投票权力掀掉了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更大的权力。韩彪费尽心思操纵村民选举,甚至用极端残酷的方式杀死新选的村长翟学礼,企图保住他坐了8年的村长位子,其真实的动机是要保住他采银矿的权力。翟村围绕“民选”展开的权力争夺,其实质是对权力所代表所控制的利益的争夺;对权力的渴求,其实是对权力所能带来的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好处的渴求。

在贾平凹的《秦腔》中,清风街村民也都有很强的权力崇拜意识。夏君亭与夏天义的权力争斗就很能说明问题。夏君亭与夏天义虽然同为夏氏家族,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斗同样激烈。其争斗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关于清风街发展路线的斗争,夏君亭要把土地作为商品市场使用,夏天义则坚守土地的农业用途,他用个人的力量去保护那块土地,他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了土地,农民就如同没有了根;有与权力有关的个人威信之争,下了台的老村长夏天义依旧想保持当权时在人们心中建立起来的地位,甚至把手伸向现行村政权,试图施加影响;新上台的村长夏君亭则竭力削弱“旧势力”的影响,以铁碗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不论是哪个方面的争斗,都意在享有更多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权力所能带来的一切。在夏中星和他的父亲身上,则看到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建立与权力崇拜的关系。夏中星的父亲是个“二诸葛”式的人物,出身低微,贫困潦倒,神神道道,即使他所属的夏氏家族是清风街的旺族,他在清风街人们的心目中也是个不怎么被人看得起的人物,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社会地位。但随着夏中星由复员兵、县政府科员、县剧团团长到副县长等等的不断升迁,这位昔日不值一文的阴阳先生风水先生在清风街的地位也就不断地提升,俨然清风街一街人的爹了。

在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李屠户家县委书记偶住了一夜的房间,成了当地人心中的“圣地”,以到此住上一夜为荣,也让李屠户从中看到了“卖点”和“商机”;镇长开车撞死了人,卑微的村民争着去替镇长顶罪,想借机做“镇长的恩人”,攀上权势人物;被镇长撞死人的家庭,不仅不要镇长承担责任,竟然还让另一个儿子做了镇长的干儿子。

李佩甫在《羊的门》中对中原乡村的权力崇拜有痛切

而尖锐的批判,譬如小说结尾对呼家堡人的权力膜拜就有近乎漫画化的描写,当听说病中呼天成又突然发起了高烧,“人们全都涌出来了,整个呼家堡的人们全都涌到了村街上,静静地等待着呼伯的消息。人们忧心忡忡地想,如果呼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活呢?!”当呼家堡人听说呼天成要听狗叫,而借来的狗不怎么配合时,“村里惟一的老闺女徐三妮突然跪了下来,她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呼伯想听狗叫,我就给他老人家学狗叫!’”于是,她竟然跪在院门前,大声地学起狗叫来……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尔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也都跟着徐三妮学起了狗叫!在黑暗之中,呼家堡传出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叫声!”这是令人极度震惊的权力膜拜图景,在被膜拜的权力者面前,村民由“人”变成了“狗”。

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出,对强权的认同和对权力的崇拜,成为乡村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宗法乡村所注重的血缘关系,致使乡村道德大都带有这种向权势依附和献媚的特征。受其影响,“当官”成为衡量农民生命价值的一种标准,甚至说得上是最高标准,当然也就成为大多数农家子弟最高的人生奋斗目标。《城的灯》(李佩甫)中的冯家昌、《向上的台阶》(周大新)中的廖怀宝等都是把“当官”作为最高人生奋斗目标的农家子弟,他们为此付出了人性异化的巨大代价。这样的一个人人都被卷入权力崇拜的魔阵之中,只能永不停息地向上攀爬,人性渐失而魔性渐生,不再是人了。从中闻到的极权专制文化传统及其现代翻新的腐臭气,看到的是民主平等精神的丧失,是生命主体性的丧失,是人性的扭曲。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权力崇拜意识之危害与残酷的批判,就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指向建构健康的个人现代性的思想表达。

二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权力进行批判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揭露当下乡村权力建构中的“潜规则”(如跑官、卖官、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及各种社会力量 and 反社会力量对乡村政权的介入或渗透,对其非正当性进行质疑和批判。《羊的门》《民选》《龙凤呈祥》(李洱)、《无根令》(阿宁)、《乡村行动》(阙迪伟)、《海赌》(林深)、《海选村长》(尚志)等小说,对乡村权力建构中的“潜规则”、乡村权力执掌者(村长、书记等)的统治术及相互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乡村普通百姓、乡村黑恶势力、资本力量和国家权力等各种力量对乡村权力的强力介入和渗透等,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海选村长》《海赌》中的乡村权力建构是国家权力与普通百姓意愿博弈的结果。《海赌》中的主人公大岸勤俭忠厚,没什么主见,本不是个当村支书的料子,却恰恰因此而被镇委书记选中,不顾村民反对让他当上了村支书。镇委书记选中有德无能的大岸,是要让他制衡原任支书现任村长大流。大流是个有能无德的坏村官,他在把村里的渔业经济搞垮的同时,却把自家搞富,官民都有意见却抓不住他损公肥私的把柄。在后来的权力争斗中,支书大岸傻人有傻福,以自己的勤俭忠厚为村里赢得了外商的亿元投资,办起了“茶诚水产有限公司”,使村里的渔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执政能力,成长为有德有能的好村官。与之相反,村长大流玩弄权术,处处使坏,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葬身大海。小说过多的情节巧合恰恰表明作者想法的天真,但其对村官应“有德有能”且“德为先”的诉求,正是对有能无德者的严正批判,而后者恰恰是当下乡村权力执掌者中的大多数,如哈耶克所说,乡村里总是最坏者当官。与《海赌》中的支书大

岸由官选不同,《海选村长》里的村长杨大牛是村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海选出来的,试图让他制衡“唯上、唯权、唯己”的支书王玉海。杨大牛秉性刚直,锄强扶弱,为了保护村民的利益,敢于抗上,使国家权力的基层代理者(乡干部)屡碰钉子,“背脊沟里冒凉气”;在国家利益(实为官家利益)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又不能违法抗上的时候,他也能履行竞选诺言,以牺牲自家的利益来应付官家杀鸡取卵式的索要(提留、税赋等等),从而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杨大牛如此当村长,维护了村民,却使自己家徒四壁,穷困不堪;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支书王玉海当官只为己,与上级官僚沆瀣一气,不顾村民死活,却把自家的小日子过得富有阔绰、光鲜滋润。小说无意作道德批判式的好坏对比、抑恶扬善,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官场”,追问权力机器是如何把“好官”变坏的。小说颇为突出地叙写了这样的细节:已无法坚持下去的杨大牛对尚有良知的金乡长诉苦时说:“给你一次面子,我的信心、人格就丢一点,我的腰就软一点,这官不就这样一步步变坏的吗?当初王玉海当支书,头三脚踢得也满正直呢,可现在他全变了。我这不也是在往那条路上滑吗?不等这届到头我就坐在群众对面的板凳上了,到那时我杨大牛就该是杨大狗了!”金乡长也出人意外地说出了同样的体认:“兄弟,你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当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也有理想有抱负,想当个好官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干点事情。可官场这个大砂轮把我的棱角打磨光了,我找不到当初的我了,我现在是谁?我是张书记门下的一名说客!”对“官场”的如此质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发人深省。

比较起来,呼家堡的支书呼天成(《羊的门》)比大岸、杨大牛等更要谙熟中国的“官场”,精于乡村“统治术”,他的村官因此当得极为“成功”。呼天成的支书宝座是历史形成的,历经时代的多次变迁,也从未被撼动过,俨然呼家堡的“神”与世俗领主。呼天成的政治智慧与统治权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向上找靠山,向下治人心。呼天成从村民不把自己看作是“政府”而只有更高一级的“政府”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上头”中发现,村级组织并不具备权力形态,要受上面各级权力机构的制约,他要在呼家堡立足,呼家堡要在世上立足,“上头”必须有靠山。基于此,他不惧承担政治风险,颇有远见地施救和结交一大批在“文革”中落难的老干部,其中的高官老秋,就是他后来最大的靠山;他同时在插队知识青年和本村青年中发现人才,将孙全林、邱建伟、冯云山、呼国庆等培养成为各级国家权力部门的官员,从而为自己也为呼家堡编织起了一张强大的权力关系网。向下治人心,也是支书呼天成的拿手好戏。呼天成从他的为官经验体悟到,要掌管一个村子,就必须彻底征服人心,“镇住了心,也就镇住了人”。于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借不同时期的政治话语霸权,从政治、经济、情感等各个方面对村民实施专制统治,在将自己塑造成呼家堡的“神”和领主的同时,把村民矮化成权力膜拜者和臣服的顺民。呼天成治下的呼家堡虽然富甲一方,有现代工业,有现代管理手段,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但其权力结构、权力观念、权力运作方式、思想观念等等,无不透着前现代性的腐臭气,说它是一个有着现代物质外壳的封建堡垒,一点也不为过。概观之,上述小说所发露的乡村权力建构与运作过程及其方式,都与更高一级的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呼家堡的权力图景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权力图景,这就使对乡村权力的批判,隐喻式地上升到了对国家权力的批判。

资本力量对乡村权力的入侵及由此引起的乡村权力的质变,也在《民选》《无根令》《乡村豪门》等不少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揭示。《无根令》中的贡

天华及其家族是小辛庄乃至皮县先富起来的大户,其创办的天华毛纺集团是很有规模的乡镇企业。贡氏家族仗仗雄厚的经济实力,不吝其财,贿赂从乡、县、市到省的各级官员,编织起强大的权力关系网,为家族的发展夯筑牢固的权力根基。由于“小辛庄乡有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家企业,贡家或贡家的亲戚有股份的就占四分之一,这里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贡氏家族“不再满足于朝里有人,而是想自己掌握权力”。贡天华于是调动各种关系,将其子贡存义塞进乡政府,得到了副乡长职位,但还不满足,千方百计地要得到乡党委书记的宝座,意在对所辖地的乡村政权施加更大的影响。而他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大到小辛庄乡“好像不是乡党委在做工作,而是他们贡家在做工作”,现在“就连有些从政的人也成了人家的工具”。在皮县,要钱又要权的大户当然不只贡天华一家,还有刘天华、薛天华、魏天华等等,个个手眼通天,根子比县委书记李智还要硬,都想利用政界达到自己的目的,“大户干政”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显示出当下乡村乃至中国的一种新的社会迹象,即资本力量已成为一种日益强大的社会性力量,并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其实现政治要求的方式,或像呼天成那样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寻找或培养代理人,或像贡氏家族的贡存义那样直接进入权力机构,执掌权柄。资本力量介入的乡村权力,毫无疑问是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亦即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与多数人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所主导的政权也就开始发生性质上的改变,即正在日益丧失乡村政权原有的“人民性”。

在当下中国乡村,资本力量往往与乡村社会黑恶势力搅在一起,难分彼此。在《民选》《乡村行动》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乡村社会黑恶势力对乡村权力的渗透,甚至比资本力量的入侵还要严重,还要邪恶。有论者在讨论中国乡村治理问题时发现,“在农村,除了公开、正式、明确的社会关系之外,还有大量灰色力量在起作用,如村内外多拳头户的小亲戚威胁使用暴力,村外黑恶势力的‘在场’等。这些灰色力量深刻地影响乃至决定了农村中正式的社会关系,并因此构成了乡村治理和农村政策实施的另一种不言而喻的‘基础’。我们通常认为乡村治理依赖的是那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因为这些公开的正式制度有国家强制力在做后盾。但在当前相当部分的农村,国家力量虽在,却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发挥作用,而乡村社会的秩序竟然被灰色势力所附着,并受灰色势力支配。乡村治理的逻辑,表面上是以那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和关系作为基础,实际上,这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及关系背后,却有一股强有力的灰色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这种灰色力量的在场,乡村社会中的人们改变了行为方式与逻辑。正式制度和法律赋予的权利,由于众所周知的灰色势力的存在,而难以真正落实。灰色力量是暗的但起着实际作用的力量,而我们讨论的那些公开的、正式的制度和关系,却是被灰色力量‘决定’后,才在‘台前’表演的。”^[4]

《民选》中的翟村政权,就是由原村长韩彪为首的黑恶势力所把持的。韩彪原本来历不明,身份不明,在他的雇主即原银矿矿主不明不白被人害死后,他就成了矿主。对下,他豢养了韩小帅等一批打手,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不许村民染指银矿,哪怕是掉落在路上的银矿石也不准捡拾,违者非死即伤;对上,金钱开路,买通大大小小的官员,县公安局、县法院就好像成了他自家开的。如韩彪贿选失败,公然指使韩小帅等打手闯入新选村长翟学礼家,企图将其杀死。赶到现场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指挥警察抓走的竟然不是私闯民宅的韩小帅等流氓,而是受害人翟学礼,而幕后指使者韩彪就坐在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指挥车里。如此反常,反常得使听到消息的省委书记认为韩彪就是一个“纯中国种的维托·考利

昂”(《教父》中的黑社会头子),省委书记“不禁暗问自己——倘十年以后,中国的维托·考利昂们举办什么喜事,那该会有多少官员驱车前往送礼、祝贺呢?”《乡村行动》中的熊家四兄弟也是上街村的流氓恶霸,而兄弟四人几乎包揽了村政权的全部重要职位:熊老三是村长,熊老大是村委兼会计,熊老二也是村委,村办工厂的法人代表还是熊老三。这些乡村流氓恶霸掌握了村里的权力与资本,欺男霸女,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在他们身上,既有地痞流氓的无赖与痞气,又有传统地主恶霸的愚昧和粗俗;既有乡村暴发户贪婪的发财欲望,又有乡村权力执掌者日益膨胀的权力欲。同《民选》中的韩彪团伙一样,熊家四兄弟也得到了国家权力基层代理者的支持。如镇委书记张小俊在保护因绑架人质而触犯刑法的熊家四兄弟不受法律惩处时说:“我也不是不知道熊家兄弟霸,不得人心,可上街村离了他们,柳镇离了他们,还真不行呢,你相信不相信?上税大户哩,你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镇里下个月就开不出工资,都喝汤去,柳镇也不要发展了。”乡村政权的黑社会化、流氓化就是在这样的乡镇“发展论”、“财政论”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权力监督”中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比之乡村权力建构中封建专制文化遗存的“腐臭气”和新生资本力量介入的“铜臭气”,黑恶势力渗透的“流氓气”则更让人们感到恐惧和忧虑。由“腐臭气”、“铜臭气”和“流氓气”等混合熏染的乡村权力,其合法性和正义性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

三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权力进行批判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揭露日渐变质变味的乡村权力给乡村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伤害。在《救灾记》(陈世旭)、《好大一对羊》(夏天敏)、《憨佬的光荣任务》(向本贵)、《命案高悬》(胡学文)、《连富叔》(阎耀明)、《永远的羊》(遥远)、《大漠祭》(雪漠)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腐败变质的乡村权力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乃至农民生命财产等方面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伤害,其存在及其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已成为中国乡村苦难的直接根源。有论者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问题时说:“古代中国县以下的‘政府机构’十分松散而不正规。”这种松散而不正规,正是使村镇、乡镇基层干部权力得以无限延伸、畸形扩大的重要原因。“尽管1983年以来乡镇地方官员已经具有国家的行政和薪资级别,并因此出现官僚化,但他们并未完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而依然与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一样介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两边,为了积累个人的身份资本,他们仍有可能服务于非国家的力量(如地方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家族与地域性经济及宗教社团)。”^{[5]162-163}他们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救灾记》将农民的痛苦和权力的腐败作了鲜明的对比,一面是受洪灾的石埠村村民贫困潦倒痛苦不堪,而另一面则是由农民供养的城山镇权势人物不顾农民死活,依然寻欢作乐。小说中的镇长宋财火是个由“媳妇熬成婆”且快到退休年龄的镇干部,有非常强烈的权力欲望,玩弄权术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实用主义恶念带到了救灾工作中,使形式主义的救灾变成了对受灾农民的大肆搜刮。譬如,省里的政策是灾区的税费可以告免,而宋财火反其道而行之,“灾前预定的镇统筹指标不但没有随灾情酌减,反而有所增加”。再如,镇电站也在抗灾时向农民提高了电费标准,而宋财火就是电站的大股东。洪灾使原本贫困的农民一贫如洗,各级权势人物的趁机搜刮又使困苦的灾民雪上加霜,真是“官祸”甚于天灾。《好大一对羊》中的官员下乡扶贫,却不顾贫困乡村的实际情况让农民养娇弱且昂贵的外国羊,同时又把这样

不切实际的扶贫工作变成了大官员的“面子工程”和乡村小官员的“马屁工程”,使被帮扶的贫困农民陷入更加贫困之中,说得上是“扶贫扶贫越扶越贫”了。

比起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来,乡村权力对农民的身体伤害和生命剥夺,则显得更加残酷。《命案高悬》中的尹小梅牵牛进草场吃草,违反了乡里政策,结果被乡长毛文明和派出所所长活活整死。整人者以拙劣的借口掩盖真相,群众也噤若寒蝉。乡村极权者轻视农民的生命权力,视人命如草芥,却很在意自己的所谓“领导威信”,不许冒犯。毛乡长威胁尹小梅时就这样说:“想搞对抗,没门儿!都像她这样,乡里的威信往哪儿搁?”这就是乡村极权者的专制主义卑劣面孔。比之《月兰》(韩少功)中月兰的“自杀”,尹小梅的“他杀”就显得更加悲惨了。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仿佛变得更加黑暗了。

乡村权力对农民危害更深的是农民的精神,是农民的文化人格。农民的依附心理、权力崇拜、愚昧保守等精神病态,都是具有“腐臭气”、“铜臭气”和“流氓气”的乡村极权者及其背后的国家极权专制统治的结果。《黑猪毛白猪毛》中,吴家坡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依附病,无疑是镇长那类权势者统治的结果。《羊的门》中,呼家堡人的权力膜拜意识和依附人格的病态生成,支书呼天成长期的专制统治当然难脱干系。因此,乡村国民性批判的对象首先不应该是乡村的无权者,而是有权者;国民性批判的前提,首先应该是乡村权力批判。

四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权力进行批判的第四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悲悯、同情甚至是欣喜的心态书写农民的反抗。《民选》《海选村长》《乡村行动》《沉默权》(梁晓声)、《三棒槌》(阎连科)、《袴镰》(李锐)、《去城里受苦吧》(张继)等作品,都叙述了农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斗争方式所进行的有限反抗,其结局往往都是非常悲惨的。《民选》《海选村长》中的村民是利用民主选举机会进行合法反抗,把损害自己利益的坏官掀下权力宝座,选上能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人。但是,农民从国家权力那里得到的真正的民选权力的机会又有多少呢?即使有一些,在形式主义的乡村权力建构方面的改革里,底层农民不仅很难直接掌权,就是代理人也很难找到。《乡村行动》中的村民对熊氏四兄弟的反抗行动,是在有正义感的乡村干部的私自组织下进行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民间集体反抗。这次反抗与镇政权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在镇委书记的干预下归于失败。熊氏四兄弟的最后被抓,是异地政权介入的结果。《沉默权》《三棒槌》《袴镰》等作品中的农民反抗,都是个人反抗。《沉默权》中的乡村女孩郑娟不幸遭到一群强暴者的轮奸,为了替受害的女儿昭雪申冤,原本老实巴交的父母悲愤地四处奔走告状,但结果却是不断失败。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几个强暴者中有权势人物的儿子。这些仅只是“处级干部”甚至还要小的权势人物,结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权力关系网,地位卑微的农民是极难突破这张魔网的笼罩与捕获的。依靠所谓的法律伸不了冤,就只有靠造点“大的响动”了,这就是夫妻双双引爆自杀,以此引起大官的重视,求得问题的解决。丈夫郑强做出极端的选择,基于这样的认识:“毕竟不是旧社会了。杨白劳喝卤水死在黄世仁的宅门外,那也就只能是活该。旧社会嘛。现在可是新社会。出了人命,造成了大影响,才有大官下令调查。只有这样,他们的钱权法的联合,才会从共产党的内部被攻破。”一个执政党的弊政,却要普通公民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唤起认识和修正,确实令人深思。《三棒槌》同样发人深省。暴发户李蟒粗野无耻,因为有点钱,竟也混上了个

什么委员,有钱时可以公然长期霸占农民石根子的老婆,有了权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忍无可忍的石根子最后愤然砸死了李蟒委员,结束了自己无权无权的屈辱人生,同时也赢得了村民的尊敬。《袴镰》中的南柳村长杜文革,霸占村上的煤窑,贪污公款。陈有来的哥哥保来,查出村长贪污,告了5年,不仅没有告倒村长,反而被村长害死在矿井里。陈有来再告3年,依然没有把村长告倒,反遭村长威胁:“你日后要是打算还在南柳村住,就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给自己留后路也得给儿子留呀,啊?好好想想吧。”面对村长的威胁,充满仇恨的陈有来在与村长的打斗中,用袴镰把杜文革的头割了下来。《沉默权》里的郑强夫妇、《三棒槌》里的石根子和《袴镰》里的陈有来,都是乡村里的弱势群体,都是受侮辱与受损害者,在被逼到不能再退的生存底线和人的尊严底线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极端的个人反抗方式。毫无疑问,这种鱼死网破的极端个人反抗,其代价是巨大的,但在弱者权力得不到保障的乡村里,只要还想保有一点人的尊严,“鱼死网破”也是没有选择的最后选择。

比较起来,代价较小而受益较大的反抗方式,是逃离乡村,使乡村权力虚空化。《去城里受苦吧》中的贵祥就选择了“逃离”这种反抗方式。村长不经贵祥同意,就私自卖了贵祥的两亩好地,事后划给他两亩薄田。贵祥要告村长李木,李木和他的老婆都非常嚣张,李木不在乎贵祥告状,甚至还说要顺便带贵祥到镇上去。村长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早已建立了一张权力关系网,成了一个“有根”的村长,村长老婆王学花对此说得很明白:“派出所和法庭的一大帮人,整天都被他喂饱了,一直没有人告他,还没有发挥过作用呢,他正想借你这事试一试,看看他们的关系到底灵不灵,你想想你能赢吗?”贵祥知道自己不是村长的对手,除了逃离,他似乎没有别的可以选择。农民进城,形成民工潮,其原因很多,像贵祥那样的乡村弱势者逃离乡村极权的压迫,也应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提出“天赋人权”,强调公民平等享受社会权力的必要。中国的乡村权力恰恰与之相反,是建立在公民不能平等享受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与国家权力机制一体化了的乡村权力,具有中国专制传统的唯权力崇拜的严重缺陷,这种权力虽然有“人民性”的话语包装,但很少考虑或基本不考虑应该为乡村民众所负的责任,只对更高的权力负责,只考虑少数有权者、有钱者和有恶德者的利益,它在运作中所鼓励的通常是人性中最卑鄙、最恶劣的那部分私欲。乡村权力构成中有国家权力“安插”的成分,有新生资本力量强力介入的成分,也有社会黑恶势力渗透的成分,而很少有能代表广大弱势农民利益的成分。乡村政权中各种势力的实际权力代理者,往往是哈耶克所说的“最坏者”。变质变味的乡村权力,正是乡村苦难的直接根源。新世纪乡土小说通过对这些现实问题的集中书写和揭露,表现出了鲜明的反封建意识和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乡村权力建构非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参考文献:

- [1] (英)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M]. 王明毅,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 童星. 中国当前腐败现象根源的社会学分析[C]// 周晓虹. 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4] 贺雪峰. 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J]. 读书, 2006(11): 130-133.
- [5] 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The Ruling Crisis and the Criticism of Power in Countryside: Series Studies of Local Color Fictions in New Century and Chinese Rural Reform

LI Xing-y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Local color fictions in new century make concentration on Chinese social severe reality in countryside, are vis-à-vis the ruling crisis in countryside, and criticize the power in countryside which is the origin of crisis. They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predicament from four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more and more consciousness of power worship; the second is the un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power in countryside influenced by family, capital and the underworld and vicious forces; the third is the damage by the power which has no people characteristics in countryside, and the fourth is approving of the contention the farmers as the weak group take in different ways. Local color fictions show anxiety for the un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power in countryside by reasons above.

Key words: local color fictions in New Century; ruling crisis; power in countryside; criticism

(责任编辑 罗 渊)